

价值耦合与实践进路：马克思职业观视域下 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图景

——重读《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李楚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摘要：重读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对于纠正当前大学生择业的功利化倾向具有重要时代价值。针对高校职业观教育中存在的内容板块化、范式单向度、协同碎片化及评价滞后性等现实困境，文章提出系统重塑路径：一是强化内容的学理耦合，实现体系化渗透；二是转向基于“生活世界”的主体建构，升级育人范式；三是构建“家—校—社—企”协同共同体，凝聚场域合力；四是完善数据驱动的全周期监测体系。旨在引导青年在社会总劳动中确证本质力量，实现职业价值的深度耦合。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职业观；立德树人；职业选择

DOI：10.65976/3080-0374.2026.05.036

引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时时刻刻关注着青年，他指出：“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1]对于高校青年学生而言，如何选择职业、如何在社会分工中确证自我价值，不仅是个人的生计问题，更是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政治命题。1835年8月，年仅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中写出了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对职业选择的标准、态度及其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刻阐释。重温这一经典文本，对于破解当前大学生职业观教育中的难题，引导青年将“小我”融入“大我”，具有深远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

一、逻辑同构与价值共生：职业观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学理定位

职业观教育并非孤立的就业指导，其本质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职业领域的具体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契合性。这种定位不仅是基于教育内容的重叠，更源于二者在立德树人逻辑链条上的高度统一。

（一）本体论层面的内涵同构：从“立德树人”到“职业铸魂”的逻辑延展

从本体论高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人们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思想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2]。

职业观教育旨在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接班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度一致。这种内涵的同构性集中体现在核心内容体系的深度嵌套上：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职业领域具体化为“以业报国”的职业价值追求；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与社会公德教育，直接映射为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而法治观与纪律教育，则构成了职业规范与契约精神的底色。因此，职业观教育中的职业责任、行业伦理等要素，在本质上完全嵌套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之中，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德”在“职业私德”层面的具体投影，二者共同服务于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时代新人这一终极本体目标。

（二）价值论层面的旨归契合：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升

在价值遵循上，二者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同遵循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职业观教育则强调“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统一”，这不仅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原理，也呼应了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诚信”的公民道德要求。二者在价值底色上高度互通，共同致力于克服职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引导学生将个体价值的实现通过职业劳动融入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之中，实现了从“谋生”之技到“铸魂”之道的价值跃升。

(三) 方法论层面的功能共振: 同向同行的实践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导向、保证与育人三大功能发挥作用, 职业观教育在运行机制上与其呈现出高度的功能耦合性。其一, 理想信念的导向共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职业观教育则将其具体化为“以业报国”的职业理想, 引导学生在职业选择中摒弃功利主义, 坚持社会本位。其二, 规范体系的保证协同。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法治与纪律观念, 这直接构成了职业观教育中“行业规范”与“契约精神”的法理基础, 二者共同发挥着规范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保证功能。其三, 主体发展的育人同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开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素质, 而职业观教育通过挖掘职业兴趣、提升职业素养, 成为实现这一育人目标的具体实践场域。二者在方法论层面互为表里, 共同构筑起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合力。

二、现实审视: 高校职业观教育的运行现状与困境

在新时代立德树人视域下, 高校职业观教育在政策供给、场域拓展及主体协同等方面已初具规模。通过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日常思政, 并辅以职业规划大赛、行业走访等实践载体, 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多元参与的育人格局。然而, 对照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发的关于职业选择的社会规定性、审美高尚性与辩证统一性要求, 当前的教育实践仍面临着学理供给予生活世界脱节、价值逻辑与技术手段错位等深层张力, 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的现实困境。

(一) 内容供给的“板块化”: 职业伦理与思政维度的学理割裂

目前, 高校职业观教育在学理架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双轨并行”特征, 这种板块化的内容供给导致了职业价值观塑造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双重流失。

其一, 思政课程在职业维度上的“中观学理”缺位。思政课作为价值引领的主阵地, 往往偏重于理想信念等宏大叙事, 缺乏向具体职业生活场域的逻辑下沉。这种“话语悬浮”状态使理论供给予现实择业之间产生断层: 学生虽能在理性层面完成对国家意志的认同, 但在面对具体的行业道德准则与岗位伦理冲突时, 往往因缺乏中观层面的学理中介进行转换, 产生严重的价值迷茫与认知恐慌。思政课教学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 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5]。

其二, 职业规划课程中“技术逻辑”对“价值逻辑”的强制僭越。与思政课的“宏大”相对, 就业指导类

课程则深陷“工具理性”窠臼, 将教育重点消解为简历包装、面试技巧等应用型技术。完全契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 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4]在此逻辑下, 学生被预设为市场中的“人力资本”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体”, 职业选择被异化为生存博弈的算法。正如马克思所忧虑的, 当职业教育丧失价值灵魂, 马克思主义职业观中关于“本质力量确证”与“行业报国”的深层意义被边缘化, 导致学生极易在择业阵痛中仅看到谋生的“苦蒂”, 而无法洞察为人类福祉劳动的本质愉悦。

其三, 职业观教育缺乏贯通“理想”与“现实”的耦合机制。内容供给的板块化, 折射出高校尚未构建起衔接“理想(大德)”与“职业操守(私德)”的学理桥梁。当马克思关于择业的经典命题被拆解为孤立的知识碎片, 而非作为整体精神坐标嵌入人才培养方案时, 职业观教育便丧失了应有的厚度。在功利主义逻辑冲击下, 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系统性浸润, 学生难以在解决生存焦虑的同时实现精神升华, 导致教育供给予学生现实诉求发生错位。

(二) 教育范式的“单向度”: 认知灌输与主体体验的知行脱节

马克思强调职业选择应是“在认清职业全部分量”后的理性自觉。然而, 然而, 审视当前高校教育实践, 职业观教育往往陷入了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困境, 即过度侧重于知识维度的单向灌输, 而忽视了学生作为主体的生命情感体验。

其一, 教学过程呈现“去主体化”的灌输依赖。目前的职业观教育多以政策解读等静态模式为主, 其逻辑基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职业观视作一套预设的“真理教条”进行单向输出。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生作为价值建构主体的生命情感与生存焦虑, 仅将复杂的价值内化简化为认知接收的机械模式。由于缺乏基于真实利益诉求的深度对话, 教育话语往往难以穿透现实主义的迷雾, 导致学生在理论层面上表现出“政治正确”的认同, 但在现实压力面前却极易产生理想幻灭, 从而滑向功利主义。

其二, 实践环节存在“去境遇化”的知行错位。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价值生成的基石。当前的职业实践多停留于“观光式”或“劳务式”的浅层水平, 侧重于技能确证而缺乏价值内化。学生因缺乏对职业背后社会关系的深度参与, 难以在“生活世界”的介

入中体悟劳动带来的内在尊严感。这种“认知高悬、体验缺失”的断裂状态，使得职业观教育无法在学生内心形成稳固的心理契约。在“理想理想”与“现实待遇”发生冲突时，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精神韧性与价值锚点。

其三，话语体系面临“生活逻辑”的现实解构。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蕴含着极强的生命张力，但在转化过程中，其情感温度常被枯燥的道德话语所过滤。当教育范式仅关注“应然”的道德劝诫，而回避市场中“异化劳动”与“岗位分层”等“实然”困境时，便会产生理论与现实的巨大撕裂。这种单向度的教育未能提供超越现实困境的逻辑工具，使得马克思主义职业观在学生心中被抽象化为“考试逻辑”，而非指导一生的“行动指南”。

（三）协同机制的“碎片化”：多元主体与全周期育人的动力消散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职业观并非在真空中生成，而是家庭、学校、社会、企业多元场域共同塑造的结果。然而，当前高校职业观教育在协同机制上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导致育人动力在多方博弈中发生抵消。

其一，校内育人力量呈现出“行政化隔离”下的动力损耗。职业观教育理应是贯穿大学生涯全过程的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常被窄化为毕业季的“突击行动”。校内各主体间存在明显的职能壁垒：思政课教师侧重宏观学理，却疏于行业实践介入；辅导员受困于事务性管理，难以进行深度的心理辅导；就业部门则多以“签约率”为导向，缺乏对价值维度的长效关注。这种“分段式、孤岛化”的模式，导致职业观教育缺乏连续性，难以形成从知识积淀到理性决策的递进式成长空间。

其二，“家—校—社—企”场域逻辑的错位与价值冲突。职业观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场域压力”。高校思政教育致力于引导青年确立奉献型理想，但这一价值逻辑常受到外部功利化逻辑的强力冲击。一是家庭维度的现实主义预设，将职业选择窄化为阶层跃升或避险的工具；二是社会维度的“绩优主义”评价，将个体价值与薪资地位深度绑定；三是企业维度的工具化逻辑，对“即战力”的追求忽视了职业人格的培育。当思政引领遭遇实用主义挑战时，因缺乏有效的跨场域协同补偿机制，教育所构建的价值防线极易崩塌。

其三，协同育人缺乏常态化的运行制度保障。目前的校企、校社协同多表现为临时性、项目式的浅层

合作，尚未建立起基于“价值共育”的深层战略伙伴关系。学校与社会主体间缺乏关于职业观教育的学理共识与数据共享，导致教育反馈滞后。正如马克思警示的，青年在有能力决定社会关系前，社会关系往往已确立。若不能构建起多方联动、逻辑自洽的协同闭环，高校职业观教育将始终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难以有效抵御异化劳动观对学生心灵的侵蚀，这就要求协同育人工作必须立足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学生进行持之以恒的全程教育工作^[5]。

（四）评价机制的“滞后性”：行为监测与成效反馈的精准度缺失

评价机制是高校职业观教育的“指挥棒”。马克思在探讨职业选择时，强调的是贯穿始终的“深思熟虑”与“尊严感”。然而，目前高校职业观教育评价深陷“结果主义”与“技术主义”窠臼，呈现显著的滞后性。

其一，评价指标的“物化”倾向遮蔽了价值层面的深层考核。长期以来，高校对职业观教育成效的评估过度依赖初次就业率、签约率及平均起薪等显性数据。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逻辑，本质上是将具有精神属性的价值塑造简化为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交易。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职业观教育的核心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目前的指标体系对学生内在的理想认同度、行业伦理守信度及奉献意识等隐性素养缺乏科学考核，导致教育实践在“数据繁荣”中掩盖了学生精神坐标位移的危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是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标准，^[6]要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身性能是否满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是否满足师生成长发展需要的状况或水平作出价值判断^[7]。

其二，监测过程的“中断性”导致育人逻辑的长周期断裂。职业观的生成是认知、情感、意志向行为转化的动态演化过程。然而，现有评价模式多呈现“断层式”特征：仅在入校测评与离校统计两个节点进行数据采集，忽视了大学四年间学生职业心理的波动与择业动机的演变。由于缺乏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追踪，教育者难以捕捉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导致教育干预往往滞后于现实问题的产生，难以实现马克思倡导的引导青年进行“冷静研究”的预设目标。

其三，反馈机制的“单向度”阻滞了教学供给的精准优化。评价的终极价值在于反哺教学，但目前反馈机制普遍存在“供需错位”问题。一方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素养的真实评价难以实时回流至思政课堂；另一方面，学生在职场初期遭遇的伦理困境与

心理落差缺乏系统采集,无法转化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依据。这种评价与反馈的“脱靶”,使教育处于“盲目供给”状态,难以实施“精准滴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职业观在解决现实矛盾中的战斗力。

三、实践进路:马克思职业观视域下的教育重塑

(一) 强化内容耦合:从“板块化”走向马克思主义职业观的“体系化渗透”

针对职业观教育与思政教育内容脱节、学理割裂的现状,高校应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纽带,推动“价值引领”与“职业实务”的深度耦合,构建起逻辑自洽、内涵丰富的体系化内容供给模式。

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职业价值观向思政课程的“学理嵌入”。应改变思政教育在职业维度上的“理论悬浮”状态,将马克思关于职业选择的经典命题深度融入教学大纲。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刻领悟“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深层逻辑:这种奉献并非对个体价值的舍弃,而是实现“本质力量确证”的唯一途径。将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不仅能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劳动实践,且能够在引导大学生提高专业能力、掌握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和提升劳动本领的同时,培养其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知”与“行”的统一^[8]。

其二,实现“价值理性”对就业指导课程的“逻辑重构”。应纠正就业指导过度依循“工具理性”的偏向,在技巧传授中植入价值灵魂。正如马克思所言,过硬的专业本领是人类幸福的基础。高校应通过课程重组,引导学生从关注薪资、编制等外在指标,转向关注职业本身的社会贡献度与人格尊严感。将马克思关于“选择最能为人增加尊严的职业”的论断,转化为评价职业优劣的内在尺度,引导学生在提升求职竞争力的同时,确立正确的价值坐标。

其三,促进“专业创新”与“国家战略”的“实践共振”。内容的耦合最终落实于专业认同。高校应鼓励科研创新锚定社会实际需求,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引导大学生参与面向民生福祉、呼应国家战略的科研项目。这种实践不仅是技能的磨炼,更是价值的内化,使学生在专业探索中体悟:每一项技术突破都是在践行崇高的职业理想。通过这种“科研育人”与“价值育人”的同频共振,从根本上消解教育供给的板块化矛盾,增强学生用专业能力服务社会的价值自觉。

(二) 转向主体建构:从“单向度”走向基于生活世界的“体验式育人”

针对教育范式中“认知灌输”与“主体体验”脱节的问题,高校应回归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本义,通过构建沉浸式、对话式与实战化场域,激活学生在择业中的主体性,实现从“被动受教”向“主动建构”的范式转型。

其一,重塑教学场域:从静态宣讲转向交互式价值省思。高校应打破单向度的“满堂灌”模式,构建基于问题导向的对话式课堂。教师应从政策宣讲者转变为价值观逻辑的“助产士”,通过引入职场两难困境与行业伦理冲突,引导学生在思想碰撞中由感性冲动走向理性自觉。建立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层面思考的逻辑整体,使学生对问题形成多角度、多层次、整体化的认知,避免看待问题简单化、表面化。^[9]同时,依托《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等经典文本研读,驱动学生进行深度自我审视,在“虚荣”与“使命”的辨析中抵御功利主义侵蚀,提升职业选择的道德厚度。

其二,强化情境体验:从角色扮演转向抗压性心理淬炼。职业不仅有理想光环,更包含马克思所言的“苦蒂”与“荆棘”。教育应从书本转向高仿真的“模拟职场”,通过场景化训练修缮学生的职业心理契约。大学生处于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如何强化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韧性,培育其积极心理品质和心理压力应对机制,已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10]。在分工协作中,引导学生体悟马克思强调的诚信与担当原则,确证职业的社会关系属性。针对心理脆弱化倾向,应在实训中嵌入压力测试与挫折教育,锻炼其面对就业压力与复杂难题时的心理韧性。唯有经历过“分量”的心理淬炼,方能实现“重担不能把我们压倒”的意志跃迁。

其三,深化实践内化:从技能确证转向“全要素”价值认知。马克思指出,抉择的成熟取决于对职业“全部分量”的认清。高校应通过改革职业规划大赛与实习评价标准,将考察重点从“技能熟练度”延伸至对行业痛点、社会价值的理解深度。鼓励学生深入行业一线,通过“生活世界”的介入避免“热情的欺骗”。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加强高校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是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11]。依托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等载体,引导学生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中检验职业理想。通过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耦合,使职业超越谋生手段,成为确证本质力量的舞台。

(三)凝聚场域合力:从“碎片化”走向“家—校—社—企”协同的育人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揭示了职业观生成的社会根源性,即个体的职业价值取向是多重社会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针对育人主体间的逻辑错位,高校应整合多方资源,构建价值共识、责任共担的育人共同体,消解功利主义的外部干扰。

其一,打通“校—企—社”资源壁垒,构建基于“价值共育”的深度合作机制。2025年1月,我国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需要在教育领域构建“八大体系”,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要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12]。高校应推动职业观教育由“封闭式知识传授”向“开放式社会实践”转型。通过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引入教学,聘请大国工匠担任校外导师,让学生在行业叙事中体悟马克思倡导的“职业尊严”与“责任担当”。同时,应引导科研创新锚定社会战略需求,依托“产学研用”平台使大学生投身民生项目。在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劳动推动社会进步的本质意义,实现从“谋生”向“奉献”的价值跃迁,响应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教育强国目标。

其二,强化“家—校”价值对齐,形成抵御功利化侵蚀的教育合力。2024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要求“通过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共同研究、推动破解学生成长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围绕学生在校内外学习生活的时间轴和空间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条件保障”。马克思警示,青年在决定社会关系前,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家庭作为社会化首属群体,其传递的职业期望具有先验影响。面对部分家庭“唯薪资、唯编制”的现实主义倾向,高校应建立常态化家校联动机制。通过家长课堂等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职业观的当代价值,引导家长纠正功利化偏见,确立“人尽其才、服务社会”的成才标准。当家庭“微观期望”与学校“宏观引导”实现同频共振,方能营造鼓励探索、崇尚奉献的支持性环境,从源头消解“内卷”与“躺平”的社会心理根源。

(四)驱动精准反馈:从“滞后性”走向数据驱动的“全周期监测评价”

针对当前评价机制中“结果导向”与“反馈断裂”的痼疾,高校应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构建涵

盖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的动态监测体系,将其转化为驱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数据引擎。

其一,构建“显隐结合”的多维评价矩阵,实现从单一指标向素养画像的转向。应改变过度依赖签约率等显性指标的现状,将触角延伸至学生的精神世界。确立“职业观”与“职业行为”双重监测维度:前者重点考察价值排序、行业伦理认知及面对挫折的意志品质;后者聚焦于社会实践投入度、实习伦理规范及志愿服务频次。通过多维指标设计,为学生绘制精准的“职业素养雷达图”,使教育者能辨识价值形成中的薄弱点,实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治理转型。

其二,建立“贯穿全程”的纵向追踪机制,打破校园与职场的时空壁垒。职业观的塑造应延伸至职业全生涯,构建“入学—培养—就业—发展”的全链条监测闭环。在校期间利用大数据平台动态跟踪价值演变,及时干预功利化苗头;毕业后建立长期追踪数据库,通过企业回访调研毕业生入职后的表现,将职业伦理履行度与岗位社会匹配度作为检验育人成效的“试金石”。这种长周期验证机制,有效解决了成效衡量滞后与数据反馈偏差的难题。

其三,形成“数据反哺”的教学改进回路,驱动育人模式的自我革新。监测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跟踪—反馈—优化”的闭环。高校应建立常态化预警机制,定期发布职业价值观发展报告,将共性问题(如特定行业伦理缺失、基层就业意愿低迷等)实时反馈至人才培养侧。作为修订培养方案、调整课程模块的实证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循环确保了教育供给予时代动态、学生需求的深度契合,推动马克思主义职业观教育在“实践—评价—改进”的螺旋上升中实现完善。

四、结语

马克思的职业选择逻辑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本文透视了当前教育中工具理性扩张的困境,并从学理、范式、场域、评价四维构建了重塑进路。高校应引导青年超越生计博弈,将职业理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在“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中确证本质力量。唯有如此,方能让“重担不能把我们压倒”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最响亮的精神底色。

参考文献:

- [1] 朱基钗,高蕾,董博婷等.习近平的青春观[N].人民日报,2025,7.3(01).
- [2]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

- [3] 楚国清. “大思政课”善用之 [J]. 北京教育 (高教), 2023(3):6-21.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50.
- [5] 耿海倩.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研究 [D]. 山东大学, 2022.
- [6] 吴林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评价的概念厘定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2):65-68.
- [7] 韩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逻辑生成与实践路向 [J]. 江苏高教, 2025(7):120-124.
- [8] 黄发友, 丁燕婷. 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论略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6(2):63-67.
- [9] 杨林香.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式教学改革探索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11):51-54.
- [10] 郑莉娟, 郑刚, 宋晓波. 网络人际交往影响大学生心理韧性研究——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和网络素养的调节机制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 42(3):61-73.
- [11] 王衡, 王诗龙. 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2):138-145.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N]. 人民日报, 2025-01-20(6).